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L011）最终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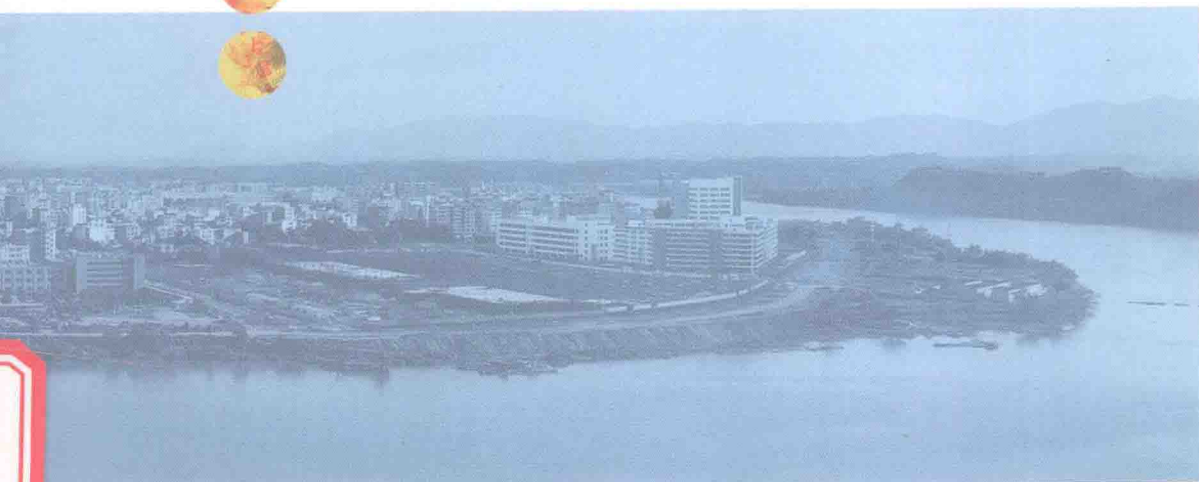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Quality
Understanding and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Model

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

| 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



李子联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L011）最终成果

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

| 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

李子联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李子联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 - 7 - 5141 - 7245 - 4

I. ①收… II. ①李… III. ①收入分配 - 关系 - 经济增长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5693 号

责任编辑：刘 莎

责任校对：王肖楠

责任印制：邱 天

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

李子联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22.75 印张 500000 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245 - 4 定价：7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构建新常态背景下增长 动力的新机制

(代序言)

沈坤荣*

放眼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正全面启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也正步入深化期，结构性深度改革的全球性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方位展开，这要求我们应该以新的标准和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和动力构建问题。在全球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面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从新常态的内涵和所衍生的外延来看，中国式的新常态除了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滞胀”隐患出现这些不利因素外，也表现为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等有利因素。更为精练地，这些特征可以被高度概括为几个动态式的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具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化。迈克尔·波特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量将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4个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及相互作用的有效性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自然环境、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投入来发挥国家竞争优势。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的经济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推动，属于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在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驱动，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发展作出了主要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则相对较低。在改革开放之初，生

* 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产要素的边际报酬相对较高，我们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增加驱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也在随之不断发生变化，高投入、高增长、低消费、低就业质量的发展方式出现了许多问题，曾经以外延式、粗放型、总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在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挑战的同时，也受到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不可持续供给的约束。要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克服国内资源环境的强约束，必须关注技术创新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推动作用，从要素导向、投资导向步入创新导向阶段。

第二，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变化。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学者指出当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高储蓄率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源泉，即存在人口红利。但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快于其他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人口增长率将会趋于降低，人口就会出现老龄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4亿，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相伴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了8.87%。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当人口老龄化使得其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的时候，人口红利便会丧失，原有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将消失。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新常态下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表现就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显著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6957亿元，比上年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9684亿元，比上年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62204亿元，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12520亿元，比上年增长8.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为10.0%、43.9%和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但从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9%、48.3%和46.8%，GDP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的乘积分别为0.4%、3.7%、3.6%。从要素转移视角来看，现有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低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增长率部门的流动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一直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对

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第二产业内部的生产率贡献相对较大。但是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弱于劳动的流动性，资本要素转移的贡献则与劳动力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只发挥了微弱的效应。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要素转移对于增长的效应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第四，产业结构升级中技术选择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有效性，可以有效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技术进步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通过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或本国技术自主研发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的增长。只有结合要素禀赋结构并在能够吸纳新技术的前提下，技术选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不断增长，重工业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对新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将持续增强，产业结构将会得到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技术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显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非常有限，而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来提高制造业吸引投资的能力，促进制造业的回归、重整和提升；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及高技术出口管制等方略来构筑坚固的技术壁垒，这就会使得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高技术的难度明显加大。随着制造业回归本土，发达国家就可以采用先进技术对制造业进行全新的改造，重获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大大降低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国以前较长时期内依靠劳动力成本所获得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丧失。因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程中技术选择、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内容也需要相应随之发生变化。

第五，资源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1978~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 144万吨标准煤迅速上升到375 000万吨标准煤。工业生产活动不仅大量消耗了自然资源，而且也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环境。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去换取工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环境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其对生态系统也带来巨大的负担。由于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身较少，以往粗放型、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又持续削弱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再加上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消费需求的增长、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对资源消耗的需求大大提高等多种因

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我国资源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低碳经济，加快对高耗能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促进资源环境的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政策刺激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能否适应经济新常态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否能够相应发生转变。

第一，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从要素导向、投资导向进入到创新导向阶段，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创新驱动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创新驱动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系统中各相关生产要素间充满着深层次的技术关联。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促成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从而高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其次，创新驱动能够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两大增长路径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规模扩张路径和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效率提升路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弱，这时可通过对创新依赖不强的规模扩张路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水平达到比较高的阶段时，资源环境的约束就会不断地得到强化，规模扩张路径下的发展方式便不可持续，需及时推动经济增长路径的恰当转换。创新驱动能够大大优化要素的配置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向效率提升的阶段转变。最后，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经济发展除必要的经济成本外，不可避免地还包含着环境成本。以往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这就会造成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过度利用，并以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为发展的沉重代价。创新驱动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显著降低生产投入与消耗，淘汰高污染产能，大大降低污染排放，从而促成传统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方式向着现代的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

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中特别强调创新的驱动力作用，通过利用科学知识、先进技术、新型企业组织制度以及现代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既有的资本、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创新的组合，通过改造物质资本、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在合理配置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新驱动的实质体现的

是科技创新，利用成熟可靠的科技创新成果来改造旧产业并且催生新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又不断地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励，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第二，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力增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大量低水平生产能力将出现过剩，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造成较大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失业、扩大内需、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选择了“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开始向本土回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正大力发展制造业，与我国形成了日趋激烈的同质竞争。因此，大力提升制造业的质量与效益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在产品质量、稳定性以及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过程中，将面临技术装备的新一轮更新改造，高端制造业的成长成为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高端制造业。

此外，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互促共进。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要素、拉动许多产业的发展，其发展对带动服务业增长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能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通信、工程技术、创意设计、研发、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与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高度相关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均包含着大量的制造业升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现有产业的深化发展与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均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及相应的现代服务业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分配失衡状况也在不断加剧，从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从收入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来看居民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城乡间、个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它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首先，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能够扩大消费需求。一般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高收入阶层通常会偏爱高档消费品，

对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的效应不够明显；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则购买力有限，消费需求受到极大的制约，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劳动要素分配份额过低会导致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因此，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会严重影响到劳动者接受教育、通过培训获得技能的机会。不同的收入阶层会根据各自的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如何来进行投资。当收入差距过大时，低收入阶层将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当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时，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下降会将失衡状态传导至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低收入劳动者很难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获得收入增长，由此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状态进一步被强化，从而阻碍到经济增长。

2014年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同比名义增长11.5%，创下了自2006年3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同比名义增长15.9%，更是跌到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已难以避免，以往主要依靠劳动力规模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人口增长减缓的严重制约，因而通过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来全方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也就变得至关重要。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在改革目标和价值判断上要强调改革成果的股份性，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就上述三种重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手段而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更为重要。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化不仅能够从需求层面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投资质量和重构贸易模式，还能够从供给层面促进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促进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更能够从社会层面增进政治的稳定、教育的公平以及社会的和谐。因此，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能够从微观层面激励经济个体把“蛋糕做大”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够从宏观层面分别促进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这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而言，我们认为

应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坚定“壮士断腕”的改革魄力和秉承“统一战线”的改革智慧。这就要求：一方面，应更加重视机会平等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让社会所有公众都能更加平等地参与经济建设、享受医疗保障、获取教育培训等活动。应进一步破除劳动要素市场的垄断壁垒，坚持人才选拔的唯贤理念；应进一步取消城乡分割的传统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优化配置；应进一步约束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推进阶层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在继续加大对低收入者特别是最低收入者补助力度的同时，创造对口的就业机会以使这部分人群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应提高税收免征额和应税税率，以使更多中等收入者能够获得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并使中产人群规模得到不断壮大；应扩增财产税以增加纳税种类，使高收入者特别是最高收入者对社会总税收的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政府应将所增长的税收更大比例地投入于公共服务支出项目中，特别应加大惠民项目的支出，以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李子联博士所著的《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一书即从收入分配改革及其深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经济增长动力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合理路径。全书的亮点在于：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渠道，此书从经济增长质量所涵盖的消费需求、对外贸易和自主创新等几个重要维度揭示了收入分配影响增长质量的传导机制，在国内外系统的理论文献中相对较为少见。第二，观点新颖独到。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或者回答中国经济为何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目前和未来面临着哪些发展约束，尽管很多文献就此展开了研究，且都得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但仔细追究，发现都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此书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解释中国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成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转变发展方式以提质增效，则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使结构更优、效率更高、差距更小，应该说是较为新颖和独到的。第三，思维张弛有度。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既关注经济问题，又关注社会问题，既严肃，又活泼，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较全的学科知识和较广的研究兴趣，因此此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为其博士生导师，很欣慰地看到学生能在问题把握和解决能力上的加强，同时也希望李子联博士能够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勇于攀登，争取更大的进步！

前言 一个重要的研究介绍

中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紧缺、环境恶化和结构失衡等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这一发展中的“两难困境”是由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从经济现实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在供给上体现为要素投入而非创新驱动，在需求上则体现为外需拉动而非内需推动，因此，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可以具象为“要素投入型增长”和“外向型经济增长”。毋庸置疑，这一模式对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言则贡献甚小。从内涵上来看，一种更加注重质量的增长，是一种在追求一定增长数量的前提下，使效率更高、结构更优化以及技术更进步的增长，是一种能够将生产成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共享的增长。而粗放型经济增长，不管是在效率提高，还是在结构优化，抑或是在成果共享等方面，都与质量型增长存在较大的差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更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共处格局的有效构建。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逻辑上来看应首先转变现有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而探寻粗放型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则是关键。不同于现有研究中的相关解释，我们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一种制度及其演变的结果，是引致“要素投入型增长”和“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因而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其简单的机理在于：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使社会更加倾向于积累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这就导致了社会物质资本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不足，前者显然为社会投资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资金支持，因而带来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后者则明显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提升，使得生产投资只能依赖于资本驱动下的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投入。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占总人口较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明显偏低，既表现在其消费规模小，又表现在其消费层次低，这将进一步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只能通过外部需求来购买实现。综合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既带来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创新的缺

乏，又带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和贸易顺差的扩大，两者都共同引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一种更加注重公平且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则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和优化。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应从缩小收入差距和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一角度来实现，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则是关键。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看，探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我们很容易在模型中通过对不同分配情景进行假设，并运用逻辑演绎来分析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但在实证研究中，对于这一传导机制的分析则应首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概念有一个变量设置上的度量。那么，如何测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少安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他提议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等指标即可适当且有效地来进行衡量，因为“基尼系数小了，收入分配自然就改革得更加平等了”。这一观点同样也得到了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①、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和南开大学冼国明教授等人的认同与支持。与此观点相契合的是，我们认为：收入分配结果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直接呈现，探寻收入分配改革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机制，即是将收入分配结果视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视角分析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一种反证式的逻辑显示，如果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带来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那么另一种更加注重公平且有效原则的分配制度改革则将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尝试以收入分配制度为外生变量，进而揭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改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传导机制，并基于这一分析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个收入分配改革角度上的思考。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能够有效解释内需不足、进而需求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原因，对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具有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能够有效解释创新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效率不高的原因，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制度性解释和政策建议；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包容性增长理念得到有效实施；能够有效解释贸易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思考。

此项研究的第一章首先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谈起，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在于构建公平且有效的分配机制；从伦理和经济史两个维度探讨了公平与有效的关系，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经济绩效，为全书的论证奠定了逻辑基础。第二章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格局及发展约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

^① 沈坤荣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国经济增长应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模式过渡，并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框架。第三章是收入分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总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旨在从总体上揭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变结果影响“外需依赖型”和“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传导机制。第四章和第五章以上述章节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分别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大的层面，从消费需求、对外贸易、政府支出、自主创新、劳动要素配置和社会稳定六个细化层面对收入分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维度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结果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仅在于揭示社会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在于揭示刑事犯罪的多少——也就是劳动投入减少的程度对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此小节既是一个补充，更是一个拓展。另外，我们并未在这些章节中单独分析收入分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而是将其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嵌入到收入分配制度影响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分析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博弈过程，指出不同的经济主体由于从分配改革中所获得的收入不同而将对分配政策产生不同的偏好，并以此而制定不同的分配政策。第七章则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农民增收。做此安排主要是考虑，既然收入分配结果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那么，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化无疑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渠道，而提高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群体的收入水平则是改革的重点。此项研究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分析了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在上述研究内容中，我们尝试做到：第一，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规范分析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标准，并探讨理论和政策如何运用和实施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实证研究则通过现象描述，回答我国现阶段有关收入状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第二，注重数理统计方法和计量经济方法相结合。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收入分配改革与供求结构进而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并进而揭示这一影响过程的内在传导机制；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收入分配改革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进而揭示其内在的影响机理。第三，注重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在对相关文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回顾时将运用历史方法进行分析；在分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时将运用逻辑方法。可能的创新在于：不同于已有研究从信贷约束、政治投票、社会稳定及储蓄差异四个渠道来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此项研究从新古典经济学供给结构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改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以图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此项研究拟从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结果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尝试作出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从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结果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我国“低消费、高投资、外需依赖”型需求结构和“要素投入”而非“创新驱动”型供给结构的主要成因，后者长期以来推动了数量的增长，但却并未带来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降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经济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依赖于粗放型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共同驱动；收入分配不平等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廉价劳动力在成为外贸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对未来贸易质量的提升形成了制约；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收入分配不平等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倒“U”型的曲线关系，适度的不平等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其进一步恶化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可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构建一项更加注重公平和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能够从需求结构、技术创新和经济平稳上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还能够通过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来看，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及财政支出中各项民生支出占比降低，“无序性”则体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有悖于市场规则 and 法律法规，两者所带来的分配格局失衡是由劳动要素丰裕且廉价、产业选择及政策偏向以及“事权”和“税权”不对等所造成的。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应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扩大就业吸纳空间；应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居民增收能力；应构建机会平等机制，夯实制度公正平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结果公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此项研究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收入分配改革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研究”（13CJL011）的最终成果，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让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开展；此中大部分内容均已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权威核心杂志公开发表，并有多篇

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二次引用和转载，感谢这些杂志编辑部的老师，让我们的成果得以有效呈现；同时，一并感谢课题组成员以及为此项研究做出贡献的同事和亲友。囿于水平所限，此项研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

2016年7月，徐州牛山

目 录

第一章 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其绩效	
——兼论公平且有效的分配机制	1
第一节 分配理论中的二律背反	1
第二节 “公平”与“有效”在当代中国的思想流变	6
第三节 “公平”与“有效”在中国的制度呈现 及其绩效	13
第二章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	25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	25
第二节 新常态下的增长约束与动力	33
第三节 向富有质量的包容性增长转变	39
第四节 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46
第三章 收入分配制度与增长模式	56
第一节 分配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56
第二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需求结构	67
第三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供给结构	82
第四章 收入分配制度与需求结构	95
第一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需求	95
第二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贸易模式	106
第三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汇率变动	122
第四节 收入分配与政府税收	134
第五章 收入分配制度与供给结构	147
第一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自主创新	147
第二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162
第三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刑事犯罪	179

第四节 收入分配制度与生育需求	198
第六章 收入分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216
第一节 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再分配政策的关系说起	216
第二节 收入分配前后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得失	220
第三节 中国的典型事实	227
第七章 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农民增收	235
第一节 农民增收的困境与路径	235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245
第三节 土地整理与农民增收	258
第四节 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	269
第八章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278
第一节 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与事实描述	278
第二节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及“合理” “有序”的解读	281
第三节 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287
附录	292
附录 1 1949 ~ 2013 年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程	292
附录 2 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发挥“增收效应”的前提	294
附录 3 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本成因	298
附录 4 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303
参考文献	313
后记	342